

# “权力”与“人性”夹缝中的流浪者

——论《沧浪之水》与《国画》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彭在钦,段晓磊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进入现代以来,权力和金钱对人的异化和影响越来越严重。阎真的《沧浪之水》与王跃文的《国画》是我国两部典型的有关官场生存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小说。面对权力和金钱的诱惑,池大为和朱怀镜最终都选择了屈服,戴上了官场角色所需要的面具。官运亨通后的他们最终在“权力”与“人性”夹缝中迷失成为精神的流浪者。在“权力”与“人性”两极的摇摆导致他们在人格上的严重分裂,身处高位的他们不得不时刻面对心灵的煎熬和灵魂的拷问。

**关键词:**沧浪之水;国画;人性;迷失;权力;分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9-0165-03

阎真的《沧浪之水》与王跃文的《国画》是两部地道的官场小说,孟繁华认为官场小说的出现是一定社会现象的反映,“一是权力的异化导致官僚的腐败,它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文学有义务对此做出必要的反映;一是商业文化的驱使,商业文化可以消费一切,当官僚腐败以文学的形式出现在文化市场的时候,事实上,它也就作为一种可供展现的奇观被消费。”<sup>[1]</sup>然而《沧浪之水》和《国画》不仅仅是提供给读者一个被消费的官场奇观,它们还将知识分子在官场中的生存困境推到了读者的面前。

这两部作品分别描述了主人公池大为和朱怀镜宦海沉浮,他们在守护知识分子良知和道义的过程中迎来的是现实世界的冷眼和家人的不理解,可当他们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换取官场上的地位时,却陷入精神失落与自我价值沦丧的可怕境地。池大为和朱怀镜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权力”的引诱下迷失了“人性”,沦为权力支配下的精神流浪者。面具虽然可以遮盖面部表情的扭曲,但是无法治愈他们在人格上的严重分裂,这使身处高位的他们不得不时刻面对心灵的煎熬和灵魂的拷问。

## 1 面具:自欺与欺人

《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为经历了一番仕途上的坎坷,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儿子一波的生病和上学问题的解决都和自己在官场上的地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和钱这两个他最不在乎的俗物“硬邦邦地挡在路上”,任谁

也是无法绕过去的,“人活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靠这两个俗物”<sup>[2]</sup>。为了家庭劳碌奔波的凡人只能关注他们真实的可见的平凡瞬间,而所谓的“天下意识”和“千秋情怀”对于他们所在乎的现实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为了能够获得马厅长的赏识,池大为和自己的老婆董柳戴着虚伪的面具小心翼翼地在马厅长家里演双簧。马厅长也揣着明白装糊涂安心享受他们的表演,就像池大为安慰董柳所说的,“大家知道是戏!演这一场也是必要的,心照不宣”,“只要你为他好,你怎么演他总不会有意见吧”<sup>[2]</sup>。“照理说装聋作哑就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可是你不装聋作哑就让你不配做人”<sup>[2]</sup>,池大为曾经所执着的“天下意识”和“千秋情怀”只能让他赤裸裸的将自己暴露在一群演戏的人面前,他漠视演戏和戴着面具的规则,而掌控规则的领导者以及深谙此道的圈内人自然就会将他作为傻子排挤出去。“当虚伪成了一条规则,人就不会再有虚伪感,也不会有心理压力,不过是按规则办事罢了,社会也因此对一些事情视而不见”<sup>[2]</sup>。戴上“面具”为了权和钱而翩翩起舞,但这是以抛弃自己本身的道德感为代价的。

《国画》中混迹官场三年仕途仍无起色的朱怀镜曾感叹,“我们好像活来活去都是为了人家在活,都是活给人家看的”<sup>[3]</sup>。既然是给人看的那就要好好表演,在同事面前表演不好就要给人抓住小辫子,在领导面前表演不好就得不到赏识。夜深人静时他常警醒自己,“毕竟是有

学间有身份的人,就要活得有层次有格调”<sup>[3]</sup>。“看”与“被看”,“说”与“被说”在官场中具有很微妙的意义,“看”与“说”往往是制定规则的掌控者,而“被看”和“被说”的芸芸众生则必须要带着面具一概向“看”与“说”的人看齐。朱怀镜和池大为最终是戴上了表演的“面具”,他们顺利地融入了群体,甚至是走进了核心权力圈子里。但是“面具”在戴给别人看的同时,也就麻痹和迷失了自我。失去了安放自我和心灵的精神巢穴,他们注定成为权力支配下的精神流浪者。

## 2 迷失:权力支配下的精神流浪者

王跃文曾评价朱怀镜说,他能够获得很多读者的理解甚至是认同,因为我们老百姓和官员设置了不同的道德期待,显然“中国人对官员的道德期许并不高,甚至说中国人对道德的要求在降格以求。”在掌握话语权的官员这里“人之常情”可以名正言顺地瓦解“道义”、“是非”和“原则”的道德力量,“这是我们民族性格中很糟糕的东西”<sup>[4]</sup>。朱怀镜已经深谙为官之道,在教训李明溪时他一语道出官场上的名堂,“人家是领导,不跟你先生不先生的。领导就是领导……叫柳秘书长就不能叫先生了,只能称他的职务”,“人家是副秘书长,你就不要老老实实这么提了,只提柳秘书长就行了,副字就省了”<sup>[3]</sup>。他是主动融入官场之中的,他渴望能够得到领导的赏识步步高升。与他的行为形成对比的便是他的挚友李明溪和同学曾亘——李明溪沉迷于艺术被现实逼成了疯子,而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坚信“五四的任务还未完成”的曾亘也潦倒不堪,这似乎就是王跃文所揭示的坚持操守的知识分子的下场。

与《国画》中的朱怀镜主动迎合官场的行为不同,《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一开始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甚至走了不少弯路。刚研究生毕业的池大为清高地将那些为了获得领导的赏识溜须拍马的人比作“猪人”、“狗人”,正直的他违背了马厅长意思被调到了冷水衙门中医药学会——这仅仅是与“权力”作对的悲惨下场的开始——婚后分房处处受到歧视,儿子一波要去一个好点的学校困难重重,甚至自己的儿子在受伤之后还要自己内心最鄙视的丁小槐帮忙才能顺利就医……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他的自尊。现实使池大为不得不承认,“身份就是这么重要”,“人人平等,那是安慰小人物的神话,一个温柔的骗局”<sup>[2]</sup>。官场中,大家都在围着马厅长转的时候,池大为却在固执地关注人格,作为一个坚守原则的知识分子,他是痛苦的,他无法像他父亲那样坦荡。在这个消解意义和价值的时代,任何坚固的东西在金钱和权力面前都会烟消云散,“当牺牲和坚守都只是一种说法的时候,牺牲就变得意义暧昧”<sup>[2]</sup>。在很多时候,池大为都已经下定了决心为了一家人的利益,放下心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担当和天下的情怀,一心投入生存的竞争时,知识分子反思自我的传统就会警醒他,“我是谁呢?我还是个知识分子

吗?”<sup>[2]</sup>。人的生命却是有限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热爱使上帝和彼岸的世界具有无比的诱惑性,这种幻想是对永恒的追求和努力。人总归是意义和价值的追寻者,即便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消解了上帝的合法性,“我”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不容置疑的。近代西方哲人提升人的“自我”的一系列努力就是为了弥合上帝缺失之后所造成的人与价值之间的裂缝。池大为展开了对“自我”本身的追问,“我”与“知识分子”对道义担当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

池大为为幻想着假如他做到了马厅长的位置就会实现自己心中的公平和正义,但当他登上权力的高峰时却变成了另一个“马厅长”。人类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偏执、它的特殊偏见和它的精神失调一个时代就像是一个个人一样;它有自己的清醒意识时观点上的局限性,因此就需要有一种补充式的调整。它受集体无意识的影响。”<sup>[5]</sup>在潮流中就有这么一股神秘的力量,它可以摧毁知识分子坚守的原则,它还有极其可怕的同化力量,在现代和传统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轻而易举的就被粉碎了。为了能够得到升迁,朱怀镜原初的自我早已扭曲,他变成了一个“圆滑自私、趋利避害、投机钻营、玩弄权术、没有信仰、没有原则、也没有真正的道德感和正义感”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位官员,小说中人人把他当朋友,视他为知己,他自己也以官场清流自居,虽然有时也自责和暗自忏悔”<sup>[4]</sup>。

在官场上“能说谁是真正的坏人?可有时人们只好坏起来,别无选择”<sup>[3]</sup>。对于朱怀镜和池大为来说,在官场上的曲意逢迎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已经不重要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权力欲的支配下,他们都已经沦为精神的流浪者。无论他是官场秩序的反抗者亦或是秩序的运作者,他“始终是秩序的观察者和思考者。每个官场中人都是一只蜘蛛,大家心照不宣地在织一张网。谁都在这张网里爬行,谁都被这张网粘住,谁也别想轻易逃走”<sup>[3]</sup>。

## 3 分裂:人性的煎熬和灵魂的拷问

梁启超曾根据对西方宗教信仰的研究断言中国人没有宗教,“我们若是把中国人所供祀的神,一一根究他的来历,大抵没有不是由人变来的。我们看他受祀范围的广狭,年代的久暂,和一般民众祀他的心理,做成专篇,倒是宗教史里很有精彩的一部分。所以说中国人实在没有宗教,只有崇德报功的观念。”<sup>[6]</sup>但这不是说中国真的没有宗教,梁启超恰好揭示出我国的宗教更多的是根据关系远近亲疏所建立起来的人的宗教。如果说西方式的宗教是在皈依上帝之后形成的一种“神伦关系”,那么我国则以人为中心建立了一套复杂的“人伦关系”,在这张复杂的人伦关系网中,每个人都必须充当起“网”所赋予他的角色。

面对知识分子在官场的生存困境,孟繁华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历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群体,在传统文化被

不断重构、整合的今天,只是分子的道路选择仍然是一个问题。”商业化大潮所带来的市场经济使一切都归于平面化,崇高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失去了以往的魅力,市场只承认眼前实在的利益,永恒背后的价值和意义与强劲的消费欲望相比是脆弱无力的。西方传统的“神伦关系”没有能抵住人欲望的侵蚀,神圣的光环在凡俗面前显出了颓相,但人本身所具有的灵魂和心灵成了价值和意义的栖居地。在封建道德礼教的制约下,人的宗教始终遵循着“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严格等级秩序。在西方,上帝死去了人却活了过来。在现代市场化国际大潮的猛烈冲击下,封建礼教下的等级秩序的崩溃是必然的,然而人的宗教依然存在,只不过赋予“人伦关系”现实合法性的力量由封建礼教变成了权力和金钱。如果说儒家传统下的士人是在围着礼教转,那在消费欲望支配下的现代人大都变成了权力和金钱的奴仆。

《国画》和《沧浪之水》中营造了三类知识分子,他们对信念有着不同的坚持和理解,自然就有了三种不同的处事方式,这就导致了他们三种人的不同命运。第一类是继承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知识分子,如《国画》中的李明溪、卜老先生以及《沧浪之水》中的宴老师,他们大都是怀有一种消极避世的心态。肖仁福在《隐达之间》总结道,“儒道文化是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道家讲究全隐,儒家观念里一半是达,一半是隐,这么换算过来,中国文化血脉里,也就有四分之三的基因全是隐,只有四分之一是达。换言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人的知识分子,要想抹去脑袋里的隐逸情节,是决定不可能的”<sup>[3]</sup>。而西方式的知识分子总抱有这样的观念,“如果我们只是希望得到上帝的旨意的话,那么,即便真理处于屈从的位置、依然被遮蔽,我们也应该心满意足,就好像真理处于征服者的位置上,而且全然彰显出来一样,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中,是上帝的仁慈取得了胜利,而在前一种情况中,是他的公正取得了胜利”<sup>[7]</sup>。中国传统士人遭遇穷途末路时总是顾及自身的名誉而选择逃避现实,西方知识分子则相反,他们抱有一种西西弗式无功利、不屈服精神,这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第二类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国画》中的曾俚,作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他无法像朱怀镜那样麻木的活着,他一方面继承了“大辟天下寒士”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情怀;他另一方面深受西方人文精神的影响恪守知识分子的良知,物质上的贫穷和歹人的威胁无法动摇他坚定的信念。第三类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朱怀镜和池大为,他们完成了由清高的知识分子向核心权力圈内人的痛苦转变。在市政府坐了三年冷板凳的朱怀镜,“忍耐了三年,等待了三年,观察了三年,也痛苦和矛盾了三年”,“这三年中,我时时感到不平甚至愤慨的,就是认为长官无目,总幻想着哪位有眼光的领导有一天慧眼识才,赏识我,重用我。我越是这样想就越不愿主动同领导接近,心里总是带着一股怨气。这已近乎一种病态心理了。”<sup>[3]</sup>。池大为也曾有过类似的心理状态,“人活在世界

上,有一半也是为了‘看重’这两个字活,不然追求成功干什么?”<sup>[2]</sup>正是这种“清高”地等待被领导“看重”,朱怀镜坐了三年冷板凳,而池大为也被迫调到中医药协会这个冷水衙门。但是他们的“清高”终究抵不过权力的诱惑,他们在欲拒还迎的顺应状态中终于成为了权力的奴仆,并如愿走进核心权力圈内。

严峻的生存环境使前两类知识分子不得不生活在一种困顿潦倒的状态中,但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身份、灵魂以及生命意义的执着使他们获得了一片精神的净土。他们虽然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但是他们的存在犹如一面镜子,使得那些抛弃知识分子操守的第三类人,如朱怀镜和池大为,始终感到自惭形秽。在命运面前,人往往是渺小无助的,但是敢于担当道义的知识分子如曾俚却有着蚍蜉撼树的勇气。朱怀镜和池大为虽然离弃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可他们却是唯一能够理解这种勇气的人。但也正是这种理解,使朱怀镜和池大为处于一种人格分裂状态,并要时刻忍受人性的煎熬和灵魂的拷问。

#### 4 结语

朱怀镜和池大为的人生经历,在将我们带入官场百态的同时也必然引发我们对人性和知识分子生存境况的思考。权力和金钱的诱惑可以腐蚀甚至扭曲人性,但是知识分子的操守却是社会道德和良心的一把标尺,当知识分子拜倒在权力和金钱脚下时,那就没有谁能逃得出沦为奴隶的命运了。朱怀镜和池大为的人生选择并不代表所有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但是沉溺于现实生活的他们,向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沉重的问题,“生活以无可抗拒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逼迫着每一个人,我们在把自己交给生活的时候,是否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立足之地?”<sup>[8]</sup>这值得我们每一个现代人去思考。

#### 参考文献:

- [1] 孟繁华. 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J]. 粤海风, 2002(6).
- [2] 阎真. 沧浪之水[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 [3] 王跃文. 国画[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 [4] 王 玲. 王跃文官场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蜕变[D]. 长春:吉林大学, 2011.
- [5] 马新国. 西方文论选讲[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
- [6]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卷99)[M]. 上海:中华书局, 2003.
- [7] 保罗·博维.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批判性人文主义的谱系[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8] 李阳春. 寻找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依托——评阎真长篇小说《沧浪之水》[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3(1): 72-74.

(责任校对 杨凤娥)